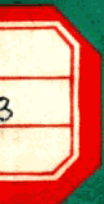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祝福青年一代

陶承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《我的一家》再版前言.....	(1)
寄自“芙蓉国”的信.....	(6)
复亲爱的青年读者.....	(15)
致故乡青年.....	(18)
致故乡观众.....	(24)
给刚果母亲的信.....	(29)
附：写给中国妈妈的一封信(刚果一青年).....	(35)
祝福青年一代.....	(35)
毫无利己之心，才是幸福的人.....	(45)
永远继承和发扬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.....	(51)
和青年工人谈前途.....	(55)
对孩子们的希望.....	(60)
写给年轻战友的话.....	(66)

为战斗在祖国边疆的青年们祝福.....(71)

学习徐老“他人第一”的作风.....(76)

回忆儿子立安.....(79)

大义微言都绚烂.....(83)

革命的母亲，不朽的战士.....(89)

何孟雄与我的一家.....(113)

感怀诗抄(二十二首).....(130)

《我的一家》再版前言

一九五六年的春天，正当杜鹃花盛开的时候，我来到了首都北京。

工人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，说是为了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希望我写写我的儿子欧阳立安的革命事迹。

回忆把我带到白色恐怖的年代。那时，革命者在反革命的刀光剑影中坚持着英勇的斗争。饥饿、贫困、被捕、杀头的威胁，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，年深日久，反而磨炼出了一种革命的韧性，任什么力量也压不倒、摧不垮。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，传给了孩子们。他们从小就懂得人为什么而生，应当怎样生。他们学着父辈的榜样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想方设法同敌人斗。立安送《大江报》的情景，好象还是昨天的事；梅生对孩子们循循善诱的话语，也仿佛还在我耳边萦

绕。但，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啊！

这些回忆，引起了工人出版社同志们的兴趣。他们说，干脆写写你的一家吧。起初我有些犹豫。后来，当我知道写书的目的，既是为了纪念死者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激励来者的时候，便觉得无法推卸这个责任了。

可我文化水平很低，没写过书，也不懂得怎样写。出版社派了编辑给我记录，让我口述。我便顺着年代讲下去，想起什么，就讲什么，断断续续，直到我没得可讲的时候为止。出版社的同志又去访问了和梅生、立安一起工作过的同志，以及同时代的一些战友，象谢老（觉哉）、廖似光、张金保、涂俊明等同志。为了比较真切地表现那个时代的斗争，他们还查阅了当时地下党办的各种报刊，甚至连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各种报纸，也都翻了一遍，为的是从正反两面的材料中得到印证。这些调查研究，这些史料的补充核实，大大弥补了我讲述的不足。当他们整理完一九三〇年的上海那一章的时候，我很高兴地说：这就是当时的上海情况。

书出以后，广大读者、特别是青年读者，真诚地欢迎它。他们给我来信，给出版社写信，表示欢迎这

本书，喜欢立安，他们把立安当成亲人，要学习他对革命的忠诚。

不过几个月的功夫，先后有两千多封信寄给了我。这些信来自祖国各地，封封都感情真挚，拿在手里，象捧着一团火。这是广大革命青年的心啊！他们十分懂得革命前辈创业的艰辛，他们想学习前辈的榜样，把自己的满腔热血，也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。这种崇高的信念，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？

书的印数，随着读者的需要猛烈激增，很短时间内，就印行了六百多万册，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书籍之一。

可是，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么一本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书，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，却招惹了有的人的嫉恨，引来了“四人帮”对它的杀伐。在“四人帮”的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大棒下，《我的一家》也象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一样，被当作“毒草”加以批判，我自己则被当作“专政对象”，被关押了五年半之久。其主要罪证就是说这本书有问题。——早在此书出版不到一年的时候，就有人放过空气，说这本书写的不真实，还把我陶承说成似乎是个骗子手。

开始我还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当“审讯”的人一

再向我逼问，要我交代我与徐老、谢老（他们曾为《我的一家》写过序言）以及其他一些老革命家的关系时，我才明白，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迫害，原来是服从于“四人帮”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的罪恶意图的。

在“文艺黑线专政论”的妖氛毒雾中，帮助我整理此书的赵洁同志，也被扣上“反革命黑作家”的大帽子，进行隔离审查、强迫劳动。而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《革命家庭》，也被江青扣上种种罪名，诬为“毒草”，横加批判。真是斩尽杀绝。

广大群众用“万恶”两个字来形容“四人帮”，确是非常恰当的。这一伙万恶的妖魔鬼怪，利用窃来的权力，大砍大杀，扼杀了多少美好的事物、优秀的作品和无辜的生命啊！每想至此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憎恨。

现在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多方面的认真负责的调查核对之后，决定重新出版这本书了。思前想后，我怎能不感慨万端！这是一本极普通的革命斗争回忆录，其中所写的主要人物，不过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当中最平凡的几个。这并不是一本什么了不起的书，但却是用鲜血写出的真实故事。我又一次把它奉献给广

大读者。它究竟是不是虚假的东西，是不是毒草，我相信读者同志是能够下判断的。

党中央英明果断，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，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，开始了新的长征，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向前。没有党，我这八十六岁的人，怎么能彻底洗刷所蒙受的不白之冤，重新出版这本小书呢？

谁说我已是风烛残年，我现在的心可轻着哩。长征再继志犹在，发白心红老返童。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。

又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的心，早已飞向那沐浴在明媚阳光下的都城北京，飞向广大热爱这本小书的读者同志。

一九七八年五月于长沙

寄自“芙蓉国”的信

一个到了暮年的人，记忆的仓库里，也还保存着闪光的珍珠。咱们离别十七年，没有通过音讯，好象已经“相忘于江湖”了。但是去年年底一个从北京来的同志对我说，《我的一家》即将重印，还带来你们的问候，于是，一些几乎忘却的往事，又浮上心头，就象你们又站在我面前了。

记得二十三年前，一个夏天，你们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跑到我家，约我写书。你们诚挚恳切的态度，使我感动了。可是我又觉得好笑：要我描龙绣凤，我是“里手”，因为我确曾拜过湘绣名师；说到写书，我可真不知要怎么回答了。不要说遣词造句，就是多写几个字，我也要头晕。你们又提出让我讲述，你们记录。咱们在庭院的藤萝架下，度过了一个夏天，又一个秋天。最后你们又跑图书馆，整整一个冬天，坐在

没有炉火的冷屋里，翻阅资料，手冻肿了，脚也冻裂了。——就是因为这个，文化革命中，你们有的同志也被关禁了一年多。谁喜欢做“文字狱”中的主角呢？光是诬蔑屈辱，就可以置人死地了。

我还记得，书出版了，六七万字，薄薄的一本。那是革命江河里涌起的一朵浪花，斗争熔炉里溅起的一粒火星。但是它却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，短短几个月，印了六百万册。可是厄运也来了。只因当时窃踞要职的“理论权威”说“是假的，不真实”，《我的一家》就被暗中扼杀了。印好的外文版本也付之一炬。这个权威人士说是假的，有什么根据呢？他说：“我在上海，不知有这个人。”他不知道我，那不奇怪，我这个做“娘姨”的，原是默默无闻。不过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，我却不会按照他的逻辑，狂妄地断言：他是不存在的！

从这以后，你们的日子就难过了。一次又一次作检查，写“交代”。你们怕我伤心，不让我知道，还安慰我说，这纯粹是出于误会。其实，我也不以为意，不印就不印吧！

后来，敬爱的周总理说了话：“不是假的，确有此事。”他们还是不让出版。根据《我的一家》改编

的电影《革命家庭》拍成了，放映了，那个家伙又跳了出来，责备编剧之一的夏衍同志“不听话”，“你要小心”，“要负责任”。这位“大人物”，可以不听总理的话；他自己的话，别人却非听不可，多么霸道呵！

鲁迅说过：“暗暗的死，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。”还说：“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，倘不知时日，不知地点，不知死法，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；由此推想那一边，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。”当初，我的儿子立安，就是被屠夫们“暗暗”杀害的。而今，在社会主义年代，这样薄薄的一本小书，又被“暗暗”处死了。

现在事情更加清楚了，这个“大人物”，从三十年代起，就扮演着反复无常的角色。他装出一副“权威”的模样，这也干涉，那也插手，这个作品“反党”，那个剧本“反动”，一不随心，就要加罪。经他点名下放“劳改”的，谁知有多少人？早就闹得想声载道，民愤难平。对我只说个“不知道”，还算是够开恩的了。

谁知事情并不就此结束，文化大革命中，更大的

迫害降临了！

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，已近黄昏了，我正同孩子玩耍，门外忽然闯进几个人来，为首的一个说：“北京来电，要你到北京去！你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，认识的人很多，很多问题要问你，你要有什么说什么，懂吧！”

我感到问题的严重。这样来势汹汹，不是好兆头，我要求跟亲人告别，但被拒绝了。

当飞机在北京降落的时候，天已很黑了。他们把我弄上汽车，直开到一个公安分局，迎接我的第一个项目是“搜身”。万想不到，我竟这样被捕了！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？面对着七手八脚的搜查，我索性扯断了纽扣，大敞着衣襟，让他们看看，我的心是什么颜色的！

北方三月的深夜，仍是刺骨的严寒，牢房的地上，又湿又冷。躺在一块木板上，盖着一床又破又薄的小被子，我心乱如麻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呵？！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共产党员怎么被投进监狱？革命者怎么到法庭受审？一定是我们党内出了坏人，一定是的！党呵！你又要遭害了！我要怎样保卫你呢？

第二天过堂，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我要实事求是

是。

一个坐在上面的人，装腔作势地问：

“这本书是你写的吗？”说着，把一本《我的一家》拍的一声，扔在桌子上。真想不到，原来是为这个！

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？”

“中央都有谁到你家去过？”

“中央有谁帮你写的？”

一连串的问题，接二连三地提出来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没有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告诉你们就是了。我才讲了一半，在中间坐着的一个麻子脸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中央的老人都被你哄了！”

这真是海外奇谈！我哄谁了？我从来没骗过人！我强压着满腔怒火，讲述着事情的真相——而这，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。他们咆哮着，拍打着桌子，一次，把两个茶杯盖都震落到地上。

开头每星期过一次堂，以后几个星期过堂一次。三天交一份材料，五日写一份坦白，内容无非还是那一套。每次过堂，都拿着这本书，颠过来倒过去的审问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有一点我是明白的，他们想“揪后台”。我说不出后台，他

们就说我写书“美化自己”。

我想了想，书里写了什么呢？既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也没有光耀史册的殊勋。它只记下了一个平凡的家庭在革命激流中的动荡生活，大部分还写的是小姊妹间的淘气、友爱，他们有的勇敢，有的脆弱，他们带着自己的优点和弱点，在革命的浪涛中成长。我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两个儿子，还有两个女儿没有长成，就夭折了。这是我的不幸，我的悲哀。怎么可以忍心说我是拿自己的痛苦来“沽名钓誉”？当年在龙华牺牲的战士，是人民给他们立了纪念碑。他们是当之无愧的。难道这是我在“美化自己”么？党是最亲的亲人，如果不是党的引导，我不是也要做“祥林嫂”么？我究竟触犯了谁家的王法呢？

就这样，我莫名其妙地坐了五个半年头的牢！整整两千个日日夜夜！精神上的刺激和病体的折磨，把我搞垮了。

病一天天加重，到一九七三年的夏天，我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们看看实在挤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，就把我送到医院里，可是又怕我死在北京，只得从医院把我弄出来，由公安人员把我押回湖南。一路上不停地打着点滴。我昏迷不醒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一九七五年七月，我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信申诉，在他的亲自关怀下，我才获得了自由。

在我被监禁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对影片《革命家庭》也进行了“围剿”。那个“理论权威”那句“要负责任”的话，可不是随便一说，罪名大得怕人，他们说影片是“狂热地吹捧‘左’倾机会主义路线”。他们不学无术，连一点起码的常识都没有。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：“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，不要否定一切。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，应作两方面的分析：一方面，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、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；另一方面，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、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，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。”这里说的不是很清楚吗？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的压迫，争取政治权利，保障经济利益，怎么就是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呢！按照他们的主张，人民大众只有去做蒋介石的“顺民”，而这恰恰是“取消主义”。

他们又瞎说影片鼓吹“资产阶级人情味”。这更荒谬。封建社会是“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

子不得不亡”，那是“宗法味”；资产阶级社会，人和人的关系是金钱关系，只有“铜臭味”；革命同志之间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，这是无产阶级应有的道德，是高尚的人情味，是应该大大提倡的，怎么竟成了罪过呢？！

他们还说：影片宣扬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。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当时客厅摆设，穿着打扮，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。拿我自己来说，过去曾假充“股东太太”，自然不会去住窝棚。可是机关一破坏，我立刻就挨饿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惯会颠倒黑白，这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反革命，生活腐朽糜烂到了极点，却要装得一本正经，真是虚伪透顶、令人作呕！

如今，真正的罪人，终于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中国人民重见天日，扬眉吐气了。我活到今天，得见《我的一家》重新再版，《革命家庭》又和广大观众见面，怎能不高兴呢！二十年过去了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？当年风华正茂的朋友，如今也该满头白发了吧。回忆往事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

在这朝辉灿烂的“芙蓉国”，高坡岭上一片苍翠，一股蓬勃的生气，使人振奋。遥望郁郁葱葱的远方，更加深了我对你们的思念。

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，为的就是今天。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了，你们又重新踏上征途。我要为所有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英雄儿女欢呼助威！

一九七九年一月于长沙